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95 期
2011 年 9 月 15 日

目 录

【论 文】

中国情结：华化、同化与异化

王赓武

民权、政权、国权——中国革命与日本黑龙会

王 柯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中国情结：华化、同化与异化¹

王赓武

今天参加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年的学术会议并作为第四届“费孝通纪念讲座”的主讲人，我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我在海外生长，对中国的乡土环境了解很少，看了费先生的书，才稍微了解一点中国传统的绅士社会和社会结构。后来我开始研究华侨社会的时候，进一步了解社会学、人类学对我们海外华人社会研究的贡献是如何重要。

费先生在晚年时倡导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从我的出发点看，海外华人其实很早就有一种“文化自觉”，但与国内汉人的“文化自觉”性质不同。这是因为海外华人和当地人在一起时，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平常来往，在交流时明显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或者是汉人，或至少是来自中国的人。在早期的来往中，就会有这种“自觉”。但这个“自觉”并没有人很好地写下来，也没有人注意。但是在外国人写的材料里提出了这样的概念。他们的报告和记录的材料里，认为这些从中国来的人——工人也好，商人也好——至少从他们的观点看是有特殊的地方，因此记录下来。这不能算是中国人自己的“自觉”。但是外国文献记录下了中国人自己所认为的他们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牵涉到我们在海外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外国人从一开始，就把这些华人叫作 Chinese，来自 China。但是，这个 Chinese 和 China 这两个字，当时在中文里很难找到一个适当的翻译。因为在汉语里说到中国人时，有很多词汇都可以用，每个朝代、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称谓、自己的说法。但这些与外国人的所谓 China、所谓 Chinese 都有区别，要去认真地考虑 China、Chinese 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要去翻译，会感觉有困难。

我特别注意到，在外国人的文献里只有这么个词。不管是来自什么地方或什么样的人，只要是从那边来的，就叫作 Chinese，那个地方就是 China。至于 China 到底在什么地方，China 多大，China 是怎样一个国家、怎样一个文明，他们不一定说得很清楚，但都用这样一个名词。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不管哪个语言（可能俄文除外）都用这个词。在东南亚，所有的语言——马来语、印度语以及西亚语言，一直到欧洲语言，都用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很难翻译。因为，在中国人的文献里，谈起这些出国的人，会说是闽粤的人，也就是福建、广东人，因为他们都是从这里出去的。清朝的时候说有些人是明朝的遗民，是明朝时候出去的，不肯效忠满清。这是我们在材料中所看到的。但是怎么翻译这个 China 和 Chinese，现在有许多困难。最后我们习惯地用“华”字。为什么用“华”呢？最早这个字是用在“华侨”、“华商”、“华工”的称谓里。这些词里用“华”，因为用这个“华”字表示的并不一定仅指汉人，也可能是满人。到海外去的那些所谓“华人”基本上是汉人，但也有少数民族，也有回族或满族，所以不能叫“汉人”，就叫“华人”。

更有意思的是，在我小时候，在华人社会中，用广东话也好，用福建话也好，他们自称为“唐人”，根本不用“汉人”这个名称。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有点奇怪，因为我自己的父母是从

¹ 本文为原香港大学校长、现任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 2011 年 11 月 10 日在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北京大学第四届“费孝通纪念讲座”上的主题讲座，根据录音整理并得到作者审定，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2011 年第 5 期。

江苏出去的，他们反而习惯用“汉人”来称呼，但到了南洋去，发现根本不用“汉人”这个词，都叫“唐人”。他们在广东话、福建话里自称为“唐人”，而北方人到南洋去，自称为“汉人”。由于在海外也有少数民族，也有满族，都参杂在海外华侨社会里，所以后来就用“华”字。“华”就比较接近于所谓Chinese、China。“中华”就代表China。但其实也不能完全代表，在中国汉语里分得很清楚，但是外国人不能分得那么清楚，从China来的，所有的人都是 Chinese。

从这里出发，我今天想谈几个字。这几个字也是从“文化自觉”的观点来看的。我用三个词，一个是“华化”，一个是“同化”，一个是“异化”。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些为什么用这三个词与文化自觉有关。

一、“华化”的概念

先讲“华化”。刚才已经谈到，“华人”是与 Chinese 最接近的一个词，但是还不能够完全反映出 Chinese 的含义。“华”字在很早的时候就被海外华人接受了，但并不是自称。从有文字记录的材料上看，自称还是以自己的家乡为主，都是某某州、某某县、某某村的人，没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除了“唐人”之外。从来自不用“华”字。这个“华”字是官方语言称呼他们为“华”：“华工”“华商”。但是为什么我用“华化”这个词呢？换句话说，到了海外之后，大家在一块工作、一块做生意时，就了解到他们之间有共同的地方，虽然来自广东、福建或广东某个地方，不管是广府人也好，客家人也好，潮州人也好，还是福建人、闽南人、莆田人、福州人或福建的客家人，他们大家就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别人称他们叫 Chinese，就用这同一个字，但他们自己的叫法是不同的。如果他们自称是“唐人”的话，为什么不说是“唐化”呢？或者因为有“汉人”，为什么不讲“汉化”？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

那么为什么用“华化”呢？我现在就先介绍一下，为什么“华化”这个概念是可以接受的。它不仅被认为是一个民族，而是来自中国，都是 Chinese。这就需要找一个共同的称呼，最后还是在清朝末年19世纪的时候，从官方找到一个正式名词，就是现在我们大家用惯了的所谓“华侨”。

“华侨”并不是他们自己称呼的，而是官方文件里称呼他们为“华侨”。由此就开始使用“华”字。从满清政府的出发点来看，“华”这个字是很适当的，因为它代表的不仅是汉人，也包括满人和其他族。我看到的许多中国国内文件档案里都以“满、汉”作为区分。但是，为什么在海外不用“汉人”，也不用“满人”，而是用“华”字，就是因为它包括汉人，也包括满人和其他少数民族。

关于“华侨”这个概念，我写过好几篇文章来考证这个概念的来源。官方认为这些在海外的“华人”，如果是侨居在外面的，认为他们常会回到家乡去，就称为“华侨”。从19世纪开始，虽然政策上实行海禁，但基本上是很宽松的，许多华工、华商经常出入，回家乡去。海禁并没有严格地去处理。

所以，当时侨居似乎并不是不对的。许多那些所谓的侨居者其实在海外已经居住好几代。土生的华人已经有好多。在19世纪初的时候，在海外的大概都是土生的，到19世纪中叶以后，鸦片战争后，出洋的劳工人数越来越多。从1850年代开始，大量到海外去，不仅到东南亚，还到澳大利亚、北美和南美。

从那个时候开始，从中国出去的人数比出生在海外的人数要多。19世纪末的时候，可以说大半都是出生在中国，而出生在当地的是少数。在这100年间，移民人口的数字，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并不算太多，每年可能一两万人。我们没有正式的数字，大概如此。到20世纪初时，比较可靠的数字显示，至少在南洋，华人已经有三、四百万人。海外华人的数量一直在增加，其中土生

的比例在降低。

土生华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尤其在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半岛，在这些地方，他们建立起相当强的华人社会。这与其它地方不同。为什么这里就建立了这样规模的社会呢？这与荷兰和英国的殖民政治有直接关系。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想跟中国做生意，希望利用这些海外华人，让他们回到广东、福建帮助他们打开市场，和当地商人做生意。由于官方限制得很厉害，所以找这些华人帮忙，使他们至少可以打开一扇小窗——大门是打不开的——到广东、福建去做生意。因为有这个政治目的，想利用这些华人，所以在各方面优待他们，承认他们有特殊的地位，跟当地的土著分别得相当清楚。尤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严格地控制华人的同时也给他们好处。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华人就建立了一种可以说是中间社会的集团。一方面比土著的社会地位要高，同时也承认政权、军权还是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了一个华人的社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呢？在英属、荷属殖民地建立起来之前，大多数去南洋的华人都渐渐地融入当地土著社会，接受土著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至少几百年前，就我们所知这种情况很普遍。因为一般来说，只有少数人出去，多半是单身汉，妇女根本没有出海到国外去的机会。那么单身汉出去，与当地的妇女成家生子，就留在那里，不再回中国。两三代之后，基本上与当地的土著不能区分了。很自然地就成为当地这些国王的臣民，同时也为当地政府服务。他们也做中国的生意，但基本接受当地的风俗习惯，接受他们的宗教，如泰国佛教、西班牙统治下菲律宾的天主教、爪哇的伊斯兰教等，华人基本上都能接受。

但是，由于荷属东印度和英属东印度的政治关系排除了华人被土著人“同化”的现象，华人建立了自己的华侨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华化”这个概念就是表示他们如何维持、保护、保卫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他们的集团——华商的网络——也就建立起来了。

同时，不管是从西方的观点，还是从土著的观点，都把华人看成是一个民族，就是“华族”。但没有用这个词，而用 Chinese。不管是哪种语言，都用 Chinese，这就是一个民族。中国没有这个词，中国也不承认他们是一个民族。他们都是各地方的人口即广东、福建的人，从北京和朝廷的观点来讲，他们不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他们不过就是在外边做点小生意，来来回回。朝廷允许他们做生意，但是不承认他们有什么身份和地位。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在海外反而有地位，被外国公司和殖民政府承认，当地土著虽然不甘愿，但也承认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就是 Chinese。在这种情况下，“华化”就有一种特殊的意识，就是一种文化自觉。他们认为，如果能够保卫、延续他们从中国带来的文化，就能够保持他们的身份，商业网络也好，风俗习惯也好，社会集团也好，宗教集团也好，都要依靠这种文化自觉来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华”字就很有意义。所以，在19世纪末官方用“华侨”这个词的时候，就认定他们是有组织、有族群、有社团，而且有相当的势力，尤其是有相当经济势力的。所以，官方就承认他们是一个特殊的集团，用“华侨”这个词来称呼他们。“华”字本来是已经可以用了，又加了一个“侨”字，就是表示他们是暂时在外，希望他们与中国保持联络。所以，官方的态度就改变了。以前是根本不重视，而且还相当地轻视，认为他们是汉奸或不忠不孝、逃亡到海外的人，不欢迎他们回来，他们如果回来的话，不小心就要被处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海外土生的华人根本就不敢回去，和中国的联络也没能很好地保持。

尽管他们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连中国话都不大会讲。尤其是那些土生华人，中国字看不懂，中国话不会讲，父亲可能还会一点，母亲是当地人，过了两三代之后，基本上就与中国没什么联系了。但是，风俗习惯还保留着，宗教还是信仰三教，也知道一点儒家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还保留着祖辈、父辈所保留的风俗，也就是闽南或广东的风俗习惯。在家庭中，虽然妻子是当地妇女，但子女尽量与其他华裔或土生华人通婚，尽量地不再与当地土著继续来往，尽量与后来

从中国出来的“新客”来往，与他们的儿女通婚，尽量地保持、保卫中国传统价值观。只有一点难以维持下去，就是文字语言，其他的风俗习惯则尽量地能维持多少就维持多少。这就是我所谓的“华化”。“华化”就是在文化的意义上还保留了“华”的概念，但是没有语言文字。除了语言文字之外，保留了其它的风俗习惯。

这与“汉化”不同。我所了解的“汉化”是北方汉人到南方去，如广东、福建等地，把当地少数民族“汉化”，使其成为后来的“唐人”，这是“汉化”。汉人到西南去，如广西、贵州、云南，这也是“汉化”。但这些在海外的华人不是“汉化”，因为他们的语言文字都没有延续，基本上保留下一些风俗习惯和社团组织，这个叫作“华化”。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文化自觉”——不完全自觉，但至少风俗习惯上还是有相当的自觉，而且保持得相当好。这已经有三百多年了，到现在为止，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三个地方还有不少土生华人跟以前一样，保留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中国话也不懂，中国字也不看，也没有兴趣，但是保留风俗习惯，而且是真地认为这些是中国传统文化，并认为是很值得骄傲的。到现在为止，还是如此。

这些土生华人也保留了自己特殊的文物和档案，他们用马来文写下的东西，他们写信用马来文写，他们把一些中国传统的故事如西游记、三国演义用马来文写下来。看的人都是当地的华裔，所以马来话很熟。他们的服装、家具、建筑都是遵循着中国的风格。他们没有直接的经验，但总是照着那个方向学习。无论如何，要建造像中国那样的房子，要保留中国的服装。尤其是男人要保留中国的服装，妇女倒不一定。饮食方面多多少少还保留了一些中国人的饮食传统，还有其他的风俗习惯，如结婚，生、死的这种仪式还是保留着，而且认为这是真正的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

最近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一批文物带到巴黎去举办了一个展览，就是“土生华人的文物展览”。在巴黎很受欢迎，许多东西写得还是不错的。许多东西到现在还保留着，这是真正的“华化”。虽然与中国已经没有关系了，但是用他们自己的自觉来保留他们所谓的中华文化。这就是他们所认为、认同的中华文化，与中国本土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化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概念：华化。

二、“同化”的概念

第二个概念就是“同化”。我为什么用这个概念呢？“华化”和“同化”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听了费先生讲的“文化自觉”理论后，自己有了一点想法，并不成熟，需要再深入地考虑。

“同化”这个概念，中国传统里是没有的。后来我才知道，“同化”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在传统里，我们用的词是“感化”或“教化”。这些词的意思就是要用中国的文化去教导这些少数民族、教育这些层次比较低的人群，感化他们，使他们能够接受高一层的文化。这些概念是从上到下的。而“同化”这个概念与之不同的地方就是，民族之间不一定有什么上下之分，可以共同互相地交流，互相地感化，也许将来可以融化成为一种新的文化。

这样来思考，“同化”概念的内涵就模糊一点，不像“教化”和“感化”那么清楚。“同化”的概念其实是翻译过来的西方学术词汇，是民族学、人类学的词汇，就是 *assimilation*。这个词从概念本身看，和“汉化”有点像。但“汉化”是单向的，而“同化”可以是双向的。那么这个概念怎么用呢？在早期海外华人历史里，在头两百年，没有这个概念。单身汉出洋，与当地妇女养下孩子，被当地土著同化，加入他们的社团，接受他们的宗教，成为他们的成员，这样的“同化”是有的，但人数不多。并且由于同化之后就不是华人了，我们也不知道规模究竟有多少，完全没有数据。但的确有这种现象。

在我最早看过的一些风土记里面，就提到过这个事情。中国人到海外去，生下的孩子就变

成当地土著，有这样的记录，但到底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心理上有什么自觉，记录里完全没有。

所以，到了19世纪末或者20世纪初，才谈论“同化”的问题。最初可能也很少谈，因为清朝末年中国的民族主义强盛起来，从孙中山谈民族主义之后，民族的概念就显明了。从前的“反清复明”中也有民族的意涵，但民族主义的概念并没有那么显明。到20世纪初的时候才开始显明。对海外华人来讲，是从20世纪初的时候，就是孙中山到南洋去之后，开始谈革命，谈反清、反满，谈汉人打天下，建立中华民国。之后也谈“五族共和”，根本就不再谈汉族，也不谈“华”。“中华民族”、“五族共和”这些概念都出来了，但是民族主义的概念很强烈。到底民族主义是以汉人为主？还是不谈种族和少数民族地位，整个都是中华民族？这些都不大清楚，也不常讨论。最主要的是，China 成为在政治上有意识的一个地方，Chinese 成为在政治上有意识的一个民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不管是汉族、唐人、汉人、华人，这些名称都不要紧，都是 Chinese。所以，这个 Chinese 更加重要了。很显明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与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有直接的关系，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西方的概念就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民族，而且一个民族最适合的政治形式是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是西欧的经验带到亚洲来。在亚洲人反帝国主义，反殖民地主义的时候，也有同样的要求。就是你们的民族主义，我们也应该有，你们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们也应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反帝运动里，说的也很响亮。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越来越显明，在海外华人世界里也越来越被重视。同时“华侨”这个名称也越来越响亮，变成一个口号了，就是所有华人都团结起来，抵制帝国主义，抵制殖民地主义。同时与土著明显地区分开，这就是“华侨”的主要概念。就是把华人团结起来，响应中国的现代化，响应中国的新的政治、新的民族主义、新的国家、新的中华民国。就是从那时开始，“华侨”这个概念可以说是相当地政治化、相当地具有政治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华化”的意思就改变了。

“同化”这个概念在南洋的应用，我现在还分不太清楚，只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同化”就是要使海外土生华人的这部分也成为华侨。这是“华化”呢，还是“同化”呢？这还不敢断定。这里面两种成分都有。换句话说，“华化”是说我们要够资格当华人，不懂得中国字、不会讲中国话的人，怎么能叫中国人呢，所以不能叫华人。你要真正“华化”的话，中文要学好，中国话要会讲，才能算是“华侨”。这个压力相当大。我们看到，现在印尼、马来西亚的土生华人中，从他们自己的文献中就能看到，他们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他们自己不会讲，孩子也不会讲，不知道从何学起，而且也不愿意学。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社区和风俗习惯。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接受了外国的文化和语言文字，而且学得很好。他们在印尼的，印尼文、马来文、爪哇文很好；在马来西亚的，马来文和英文也很好。同时再让他们学中文，他们学不好，有些也不愿意学。这里就有相当多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同化”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不允许你被当地的土著和外国人同化，同时要把你们同化为真正的中国人，而不是这种侨生的、不东不西、不懂得中国话、不会看也不愿意学的这种所谓的 Chinese。像这样的标准，压力就相当大。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南洋有好几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现象。总的来说，趋势是各种压力都有。一方面是西方的压力，也就是这些殖民地政府的，他们有语言学校，要求用殖民政府的语言去交流。另外，华人要在当地生存，就必须学土著语言。无论是马来话、泰国话、越南话……都要学当地的语言。这是另外一种压力。再加上中国人之间的压力。因为中国的“新客”——从广东、福建新近到南洋去的，他们会说，你们不是真正的中国人，一定要把你们好好地教化过来，教你中文，让你的孩子上华文学校，重新的“再中国化”。可能这是“同化”的概念，把你同化成为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华人。所以存在几方面的压力，华人也不知道如何去处理。但是那时帝国主义、殖民地政府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也非常反感，当地的土著同时也发展他们的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也讲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土著人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也非常反感。就是上面这三方面：

中国的民族主义、当地土著的民族主义、再加上西方政府的教育、法律、政治各方面的导向，让华人学习西方文化、接受西方政治法律制度和西方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同化”的概念就相当复杂。到底“同化”到哪个方向，怎么样“同化”，很难说清楚。

但是就我现在了解的，也是“文化自觉”这个概念让我想到的，就是有个总的趋势很有意思。在这各种压力之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现代化，接受科技教育。在科技工商方面、在国际贸易等各方面的影响下，现代化的概念越来越强。当然，现代化和西化不一定分得清楚。但不管是西化还是现代化，总的趋势大家都开始认识到这是一个新的选择。不一定是“华化”，不一定是和土著同化，也不一定是全盘西化。这些都不是必须走的路，但是现代化大家都接受，连中国也接受。这点很重要。也就是说，中国从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国起，到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的总趋势就是接受科学主义，接受新的现代化的东西。就意识形态来讲，还有国际主义。这些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所谓“华化”，所谓民族主义，这些都只是一部分而已，现代化的概念则更广一点。

“同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同化”中掺入了现代主义，是现代的同化。这个现代同化可以说是共同的。西方带来一部分，中国接受一部分，从中国也带来一部分。在东南亚，所有新办学校所用的课本都是从中国来的，基本上都是上海出版的书。这些课本里所讲的，除了一些传统的概念外，基本上是讲科学。教科书和学校所有的课程里，都在讲现代化。

所以，“同化”不一定是同化于中国传统文化，文化自觉与现代化又接轨了。所以，“同化”这个概念特别复杂。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与“华化”不同。“华化”有保留原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意思在里头，而“同化”是接受共同的、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些现代的、先进的、进步的思想、进步的价值观。虽然带一点民族主义，带一点传统的文化，但是基本方向是朝着进步的、先进的、科学的这条路走。所以，“同化”概念就掺杂了这许多东西。

三、“异化”的概念

最后一个概念是“异化”。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概念本来我不敢用，因为“异化”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在。在马克思的思想里，“异化”有另外一种含义，但我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阶级斗争的那种概念，也不是工业革命所讲的那种概念，也不是经济矛盾的概念。

对于这个“异化”的概念，我是这么想的。“异化”这个词，在我们传统思想里面，虽然没有这么讲，但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一种不忠不孝的概念。不接受传统的那些道统，有反抗的意识，有反叛的想法。不忠不孝就是一种“异化”的概念，是文化里一种反正统。在中国传统里面，像走江湖、参与邪教活动，这些可以说都是一种“异化”。当然，这种异化和现代社会的异化性质不同，但在过去，这个概念本身已经存在，虽然没有这个词。如果我们考虑到传统社会已经有“异化”的这种现象，如果用这么一种普遍化的概念来讲，我们现在有没有“异化”呢？

现在从海外看，最近这几十年来，从“中国”这个概念成为一个政治的概念、民族的概念、国家的概念，已经不完全是文化的概念了。刚才我讲的“同化”概念，都有政治意识在里面。“华侨”就是一个政治的概念。那么这样一来，政治斗争、中国内部斗争也带到外国去。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政治一点都不懂，但是海外社会里也分成不同的集团。受到中国政治的影响，海外社会里这种政治上的区别，各有各的党派，各有各的组织，互相斗争，有些斗争得还相当厉害。

因为有些从中国来的概念，带到海外去以后和当地情况接不上去，一点都不能融合，有的时候根本就把当地社会搞乱了。这些概念在当地的社会并没有适合的需求，可以说是一种人为植入的，不是从海外社会自然发生出来的，而是从国内带来的，一直没有被好好地解释清楚，但是它直接受中国政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海外华人就生出反感。有一种反感，是不愿意参

加中国内部的斗争，另一种反感是认为中国的那种革命的、反传统的运动，从五四运动开始，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去了解，因为他们所带出去并一直保留下来的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们对中国排除许多自身的文化传统觉得不能接受。所以，这种“异化”的成分就很多，有各种不同的现象。一方面，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传统的东西都被批评、被排除、被消灭，至少从外部看是这样的现象。另一方面，把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的国内政治带到他们那边去，使他们在海外的生活受到影响，使他们在海外与其他民族之间产生许多新的矛盾，使他们在做生意和做其它事情时遇到许多新的困难，和当地政府有许多新的政治冲突，这些矛盾使他们在海外很困窘。

在这种情况下，“异化”就渐渐地表现出来。就是认为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文化演变不一定适合他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人，尤其是土生华人。这种“异化”情况到底重要不重要？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清楚。因为他们虽然不接受中国的政治指导，至少不完全接受，有些地方还坚决反对，但同时他们的经济运营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需要经常与中国做生意，经常到中国投资、做买卖、进行交流。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文化观念上与中国渐渐有距离了。这个人数有多少呢？我不敢说，但至少在土生华人中，这个现象是相当明晰。这一百多年来，土生华人越来越多，尤其在南洋，现在土生华人已占到80%以上。那么，既然在当地出生，在当地受教育，而且所受的现代教育不是以前殖民地时期帝国主义学校里的那种教育，而是当地民族主义教育，当地民族国家的国家教育，这就使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受到当地政府与中国的外交、贸易、经济等各方面关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异化”比较特殊，可以说是文化和认同上的“异化”，但并不影响他们到中国去做生意和投资。所以，情况相当复杂。

我用“异化”这个词是有一点保留的。现在还有一种新的现象，即现在的新移民，近二三十年来去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地，这些新移民在心态上和中国的情结还是非常接近的，不同于东南亚的华人。那些在海外出生长大的东南亚华人，跟中国的关系本来就不深，而且越来越浅，所受教育是外国的教育，学讲中国话很勉强，至少南洋的这些土生华人中，能自然地讲中国话的越来越少，除了马来西亚还有一些人进华校之外，受过华文学校教育的学生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思考这种“异化”的现象？和“同化”“华化”相比，如何了解这个概念？有许多问题我还正在考虑。我目前没有什么结论，主要就是想提出问题来供大家思考。

四、中国情结

我最后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就与“中国情结”有关系。刚才我讲的“华化”和中国情结的奥妙关系就是：“华化”的背后是一种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它不是真的要了解中国，也不是真的要被划入原来的中国或者是现在的中国，它是要在它生活的社会里面保留它所谓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种概念。这与新的中国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这个“情结”还是保留着的，这个“情结”还是很宝贵的，在这个“情结”之下，它的脑子里就有一个“中国”的概念。这个“中国”的概念，与中国人、中华民族与现在的中国的概念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如果还自认为中国人，属于中华民族，自认为是华人、华裔，认为这个传统的文化与他们还有相当的关系，尽量能够保留，这些人对中国还保持有相当的热情。他们并不要完全学中国，也并不要回到传统的中国，他们只是要保留他所认为的中华传统文化，这就满足他的需要了。那么这类人，是否在将来还会存在？他们的“中国情结”会不会使其慢慢接受新中国和新中国的文化，而且因为新中国的文化是现代化的文化，是中国的现代文化，是不是更容易被他们接受？因为他们有中国情结，自认为是中国人的后裔，这个情结是否能把他们原有的“华化”的概念转变为一种新的中华文化，这是个大问题。中国的崛起对这些人会有一些影响，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还言之过早。我认为，“情结”这个概念可能还是有它的作用的，希望因为有这个“情结”，中国这个概念能够保

留着。将来中国崛起了，中国的新的现代文化能够形成了，成为一种很可爱、很值得尊敬的、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文化，那么这种“情结”还是有可能使他们渐渐接受新中国的现代文化。是不是会这样，我不敢说，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是过去的“华化”就这样保持下去，还是会从新中国这样一个概念传下去？但无论如何，仍然基本上是文化概念。根据我的理解，绝对不会有政治、意识形态在里面。这些持有当地国家护照的华人，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中国公民，他们还是外国人，但是中华文化——现代的中华文化可以接受。

至于“同化”这个概念。是希望通过中华文化使这些人保持这一传统，同时不被外国人同化。事实上是争取不被完全同化，同时能够维持华人的地位。如果新一代的华人传统能够维持下去的话，他们将来还是与“中国情结”有直接关系。“中国情结”能够使得他们始终关注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化的传承、中国政治文化的传承。我想，在“同化”的这种背景里头，这是很可能的。对这一点，我的信心大一点。对于“华化”，我不敢讲，因为对这些土生华人来说，可能很难。但是，在一、两代之后，在“同化”的背景里，部分或全部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能够接受中国新的政治文化，基本上还能够接受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在“同化”这个范围里头，因为他要避免被别的国家和别文化同化，那么，由于这个“情结”维持与中国的关系，尽量接受中国新起的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如果与他们自己所谓的先进的、进步的文化（如科技，工商管理、财政经济方面）能够接轨的话，他们基本上就能都接受，而且连政治文化都可能接受。这是“同化”的这一部分。

最后“异化”的问题就比较多，不容易说清楚。我感觉最有趣的一点，就是现在这些“异化”的人，他们可能不会接受中国的政治或者说中国的制度，但是他们会接受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果，会非常地羡慕和非常地向往。经济方面也好，科技方面也好，学术方面的交流，他们都非常愿意和中国更多地来往。所以，“异化”的程度可能就会渐渐地冲淡。

我最后的想法就是，现在海外有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很有意思，但这还是一个初步的过程，我看得还不太清楚。就在这三、四十年间，中国沿海跟东亚——不管是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华人之间的文化关系越来越近，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多，而且文化的共同点比较显明，互相影响，彼此接受。尤其是年轻一代，不管是马来西亚华人也好，香港人也好，还是中国沿海大城市的这些市民也好，尤其是年轻一代之间的文化交流似乎越来越广、越来越深。这个趋势将来怎么样，我还看不清楚。这个趋势与将来的所谓“中华现代文化”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什么分别，会不会出现一种“东亚性”，恢复整个东亚的共同的一种先进的、进步的、科学的新文化，有没有可能？“异化”的这些年轻人，在我看来他们对这个趋势是能够接受的。这是一种不讲国家、不讲民族、不讲民族国家的文化，是一种共同的东亚文化、先进的文化，好像他们能够接受。这只是我的猜想，我觉得有这个趋势。他们这些年轻人在互相交流的时候，在各方面，文艺方面也好，文学方面也好，电影、服装、建筑……各方面共同的地方好像越来越多，而且好像没有什么争议，都能够互相接受、互相欣赏。是否能够长久下去，现在还看不清楚。那么这个在这些“异化”的海外华人之中，是否能够用这个方法避免效忠于任何国家、效忠于任何民族文化，而朝这种跨国性的、区域性的东亚文化的这个方向走，好像有这样一种趋势。我现在就是借这个机会把这几条不同的路指出来，将来到底会怎么样，会演变到什么程度，会怎么样去发展，尚有待观察。

还有最后一句话，我现在所讲的基本是亚洲的这一部分，东亚、东南亚、南洋这一部分的现象，欧美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华侨、华人的现代社会，他们怎么处理他们的文化矛盾或者说文化选择，还不太清楚。其他这些国家对民族文化的影响也不清楚，西方文化这一百年来在世界上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但是以后是不是会照样控制世界文化，影响世界各地的先进文化，这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疑问。欧美的文化毕竟是西方的现代化，华人在欧美文化这种环境里面，是不是会长久

地接受这种文化，还值得考虑。我在和其他一些学者讨论的时候，他们也觉得那里的环境到底与东南亚的环境不相同。所以这种区别将来怎么样的发展，现在还不太清楚。至少，我现在用这三个概念——“华化”“同化”“异化”，先把南洋和东亚这部分、在日本和“四小龙”这个经济圈里的新的文化、这里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希望引起大家的思考。

【论 文】

民权、政权、国权 ——中国革命与日本黑龙会¹

王 柯²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然而中国的“近代”却选择了一条建设民族国家的道路。因此，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实践，使中国面对过许多必须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并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实质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解释“民族”与“国民”之间关系的问题。因为在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首先意识到的民族是“汉”与“满”，而不是在内涵上可以与“国民”部分一致起来的“中华民族”。中国之所以选择走民族国家的道路，首先是与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局势有关。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为了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就不能不说明国家疆界所在。³然而，按照“民族”的范围确定国家疆界的想法，毫无疑问是受到了自称为单一民族国家的日本的影响。⁴

以孙中山为首，接受了日本的“民族”和“民族国家”思想影响的革命家们，在实际的生活层面也与许多日本人发生过非常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有许多日本人大力支持了他们的革命活动，甚至直接加入了辛亥革命的行列，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这些日本人的活动背景上，有没有日本“民族国家”思想的痕迹？革命家们之所以选择了走建设民族国家道路，与这些日本人支持中国革命之间有无关系？反言之，这些日本人之所以理解和支持中国革命，与革命家们选择了中国走民族国家道路之间究竟有无关系？如果以上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那么这些日本人为什么会支持革命家们选择民族国家的道路，他们在革命家选择民族国家道路的问题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搞清楚这些问题，就可以明白究竟是一些什么样性质的人士，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支持了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中国革命，这对于帮助我们加深理解辛亥革命性质以及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应该具有一定的意义。

¹ 本文刊载于（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第127期。

² 作者为日本神户大学大学院教授。

³ 参见拙著《走向民族国家——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国际背景》，商务印书馆，近刊。

⁴ 参见拙文《“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Sociology of Ethnicity*，2010年第70期，第1-12页。该文曾于2003年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第77期，此次转载时曾做大量补充修改。

日本黑龙会与“革命的摇篮”

1916年6月，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大陆浪人团体“黑龙会”的最高首领、代表（有时又称“主干”）内田良平以其个人名义秘密地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篇手写的《对支私案》，其中有这样一段画龙点睛之语：“将支那本部置于共和政体下，以国民党或国民党系中有德有力者为执政；再分割满蒙及西藏三地委托于宣统帝进行统治，同时将其变成日、英、俄的保护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英、俄两国的保护权进行限制；从而使（日本——引者）帝国居于实际掌握全部统辖权的地位，此即本私案之梗概。”¹《对支私案》的主题，与内田良平、或者是他以黑龙会名义在1913年以后就日本的中国政策所提交给日本政府的报告或发表于各种场合的言论异曲同工，其中尤以《对支问题解决鄙见》最为有名，因为他在文中提出的中日《国防协约私案》，事实上成为日后“21条”的蓝本。²然而，《对支私案》在说法上却有让人耳目一新之处：

“如果说要国民党或国民党系掌握政权，就要以形成一大亲日潮流为要。如果旧约法时代约占当选议员总数七成的国民党一流人物有可以被看做是亲日派的理由的话，欲于将来进一步扶持亲日势力，最妙的就是让该党中有德有力的黄兴等成为新政府的首脑人物。如果满蒙及西藏的处分方案得到实现，这样（中国——引者）就可以减少领土被分割之虞，还不会伤害到英、俄两国的利益，（日本）帝国的势力也因此得以扩充，并且毫无疑问能够在指导民国方面得到方便和增添威力。同时对于民国来说，不仅可以因此一举得以有效转用全部的前朝优待费，同时民国政府也才可以名副其实得到实现完全统一之利益，何况这也能让革命的目的之一、即兴汉灭满的宣言得到真正实现。我坚信自己的这一私案实为铁定的最和适宜的对支政策，因此希望诸公能够在斟酌之后快刀乱麻一断了之。”³

在主张分裂中国的事情上，内田良平之所以敢于说得如此肯定、具体，理由应该与他以及日本黑龙会势力长期以来一直与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中国革命派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关。孙中山1897年8月第二次来日，9月中下旬结识了宫崎滔天和平山周等日本大陆浪人。所谓浪人，原指离开了自己所属藩到处流浪的武士阶层。到了幕府时代末期，浪人出于改变自身地位的目的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此时一部分出身平民的人也开始自称浪人。而这部分浪人之中，此后将自己政治活动的舞台主要定位于大陆（主要为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人就成为了所谓“大陆浪人”（又称“支那浪人”）。下文还将述及，大陆浪人力图通过自己的活动用自己的政治理想影响日本的外交政策，但其中许多人具有日本国家主义的思想，支持日本对外扩张。

9月27日通过孙中山通过平山周的介绍，与同大陆浪人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家犬养毅见面。平山周又经过犬养毅的介绍，从众议院议员平冈浩太郎那里为孙中山拿到了在日的生活费用。⁴平冈是日本大陆浪人的重要母体、福冈的玄洋社的第一任社长，与头山满、箱田六辅同被称为“玄洋社三杰”，日后为了支撑玄洋社的对外活动而开始经营矿山，并进而进军政界。内田良平即是平冈的外甥。此次孙中山在日本生活了一年有余，在此期间中国国内戊戌变法失败，日本大陆浪人参加了救助戊戌变法领袖的活动，宫崎滔天和平山周分别陪同康有为和梁启超由香港来到了日

¹ 「对支私案」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1門政治，1類帝国外交，2項亜細亜，『支那政見雜纂』第二卷8，B03030272300。

² 「对支问题解决鄙见」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1門政治，1類帝国外交，2項亜細亜，『支那政見雜纂』第一卷15，B03030268800。

³ 「对支私案」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1門政治，1類帝国外交，2項亜細亜，『支那政見雜纂』第二卷8，B03030272300。

⁴ 「支那革命の端緒と日支志士の提携」、葛生能久著『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黒龍会出版部、1935年、617—622页。

本。他们也曾极力促成保皇党与革命党联合，但是遭到了康有为的拒绝。孙中山此次在日本期间，结识了许多对中国政治问题感兴趣的日本政界和财界人士，也包括玄洋社的精神领袖头山满以及内田良平等日本的“大陆浪人”的头目。¹

因甲午战争之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这让具有国权主义思想的日本大陆浪人极端仇视俄国。内田良平等入于 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纷纷渡俄，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为据点，通过开设柔道道场、利用日本妓女接触俄国军官等方法观察俄国实力、盗取俄军情报和分析俄国对清国政策动向，并配合日本军参谋本部所派出的伪装成京都西本愿寺符拉迪沃斯托克别院僧侣在此活动的谍报人员花田仲之助中佐，² 以及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村怡与造等直接侦察俄国驻军情况。³ 内田良平 1898 年从俄国回到日本后即提出了“对俄必战论”，鼓吹日本应该率先对俄发动战争。正是在这年秋天，经宫崎滔天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孙中山希望内田良平支援他发动革命，内田良平告诉孙中山，“支那革命”的先决条件应是日俄开战，不然俄国就会趁乱掠夺中国领土。而孙中山告诉他：“支那革命”倘若成功，恢复被俄国所侵占失地当为易事，何况还有“日支提携”掣肘俄国。于是内田良平告诉孙：如若中国革命在先，他即停止对俄计划，首先支援孙中山的行动。⁴

1900 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时，的确得到了宫崎滔天、平山周以及内田良平等日本人的积极援助。然而，按照内田良平等入日后的解释，当年他们之所以能够开始投身于中国的革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孙逸仙等人的革命思想以灭满兴汉为标志。汉民族的革命成功了，成为失败者的满洲民族只能将自己的衰残命运托付给北方的故乡满洲，自然就要依赖俄国，这时我国就可以与革命成功了的新支那互相提携以对付俄国的南下政策，从而席卷满洲与西伯利亚，将这些地区置于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确定东亚大势，将我皇德遍照大陆之地。这种做法可以在拯救东亚危局的同时扩张我国国势。我们东方志士正是能够从这种大的视野出发，所以才开始参加筹划支那革命。爱国与义侠的两种精神的结合，让我们的开始开始在清国南部耀动。”⁵ 也就是说，日本大陆浪人之所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是在将东北地区最终纳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目的驱使下开始的。而之所以让他们能够看到这种可能性的，就是革命派所提出的“灭满兴汉”的政治主张。

惠州起义失败以后，内田良平再次埋头于其挑动发起日俄战争的活动中。1901 年 2 月，他发起成立了日本的大陆浪人组织黑龙会，所打出宗旨为：出于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为了防止西力东渐和经纶东亚，目前最为紧急的就是与俄国开战并将其赶出东亚，在此基础上将满洲蒙古西伯利亚变为一团从而打下经营大陆的基础。之所以取名为黑龙会，就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以流淌在满洲和西伯利亚之间的黑龙江为中心的“经营大陆的大业”。内田良平被推为黑龙会的主干，黑龙会的本部就设在当时位于东京市芝区西久保巴町的内田良平的家中。黑龙会的主要成员多为玄洋社出身，初建时的第一批会员中，除了内田良平外，深得孙中山信赖的平山周和深得黄兴信赖的末永节也在其中。内田良平此后一直是黑龙会的最高首领，头山满后受到邀请就任黑龙会顾问，对黑龙会的决策产生影响，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并不是黑龙会的正

¹ 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29-40 页。

² 这位花田仲之助日后在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华战争中协助日本军部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大量活动。具体可参照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92-93 页。

³ 「臥薪嘗胆と入露の人々」「浦潮方面における我が志士及び軍人の行動」、葛生能久著『東亜先覚志士伝記』上、黒龍会出版部、1935 年、569-604 頁。頭山滿、犬養毅、杉山茂丸、内田良平『玄洋社と黒龍会、あるいは行動的アジア主義の原点』書肆心水、2088 年、279-311 頁。

⁴ 内田良平自伝『硬石五拾年譜』（原著 1927 年）、葦書房、1978 年、51-52 頁。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40 页。

⁵ 「惠州事件の前後」、葛生能久著『東亜先覚志士伝記』黒龍会出版部(1935 年)上，651-652 頁。

式成员。¹

1905年7月，孙中山由法国再次来到日本东京，此时也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节节取胜时期。在宫崎滔天等人的介绍下，孙中山与留日清国学生中具有“革命”思想的黄兴、宋教仁等人先后取得联系，决定合并**兴中会**（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光复会**（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秋瑾）与**华兴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于7月30日召开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后为避免日本政府反对，改名为**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筹备会议的会址就是**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赤坂区桧町的住处**。²参加会议的除了以留学生为主的70名在日中国人之外，还有宫崎滔天、内田良平和末永节三位日本人。前已述及，内田和末永就是黑龙会的成员。更加重要的是，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同盟会的名称、宗旨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入会誓词**，并由孙中山带领出席会议者宣誓入会。据说当天因为来人太多，内田良平家日式房屋的地面都被踩塌。³8月20日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后，头山满、犬养毅、平冈浩太郎、内田良平、宫崎滔天等人又成立了“有邻会”，从财力和等方面支持同盟会。⁴因为以上种种关系，黑龙会称这一时期为“支那革命党的摇篮时期”。言外之意不言而喻：这种具有民族革命思想的中国革命就是在日本由他们这些所谓的“东亚先觉志士”所哺育的。

大陆浪人之“大陆经营”与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发生后，宫崎滔天、平山周、末永节、萱野长知、北一辉（原名北辉次郎，当时电文中多使用喜多辉次郎的名字，日语中喜多辉次郎与北辉次郎读音相同）等与黑龙会有着紧密关系的大陆浪人纷纷赶来，通过他们与革命党核心领导人物之间的关系，参与了辛亥革命的各种活动。宫崎滔天跟着陈其美（当时孙中山尚未回到国内），末永节、萱野长知跟着黄兴，北一辉跟着宋教仁，而在日本国内与这些进入革命领导中枢的日本大陆浪人进行联系的，主要就是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这从宫崎、萱野和北在给日本国内发报时总是将内田良平放在收电人首位一事中就可以看出。内田良平利用他与日本国内各界的关系，应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和陈其美等人的要求，**积极筹措军火和资金，有力地支援了革命军**。例如，内田良平11月25日就向到达上海投入陈其美阵营不久的宫崎滔天发电报，告知他可以用非常低的价钱购买到外套15000套，绒毯4000张，询问这些物资对革命军是否可以派上用场。⁵

内田良平支持辛亥革命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促成了三井银行借款。1911年12月12日上午10点50分，内田良平给上海的北一辉发电：“昨夜原口⁶电报所谈之事，实为费尽苦心方成之事，时机不可放逸。”而在当天下午六点，宋教仁和陈其美即回电委托内田良平为宋教仁、陈其美、伍廷芳和李平书的代理人，办理以“年利七分”从三井银行借款30万元事宜，包括缔结契约和接受现金。⁷1912年1月25日下午，内田给北一辉发电报告知：可以借到30万到50万，但年利

¹ 思想研究資料特輯第3号『国家主義乃至国家社会主義団体輯覧』(上)(昭和7年12月調)、1933年、37-39頁。

² 藤本尚則『巨人頭山滿翁』、政教社、1923年、509頁。

³ 「支那革命党の摇篮時代と日本志士」葛生能久著『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中、黒龍会出版部、1935年、377頁。

⁴ 藤本尚則『巨人頭山滿翁』、政教社、1923年、520-521頁。

⁵ 「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後二時十五分東京発、上海豊陽館宮崎宛、内田良平出」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公文備考類①戦役等、清国事变(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变書類 卷17 来電(11) マツデン(8)、C08041018300。

⁶ 原口要(1851年 - 1927年)，日本最早的工学博士，铁道设计者，后被孙中山邀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政顾问。

⁷ 「十二月十二日午前十時五十分東京発、上海松崎ホテル喜多輝次郎宛」、「十二月十二日午後六時十分上海発、東京麻布内田良平」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公文備考類①戦役等、清国事变(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变書類 卷17 来電(11) マツデン(8)、C08041018300。

为“8分5厘”，手续费10%，不需担保或以革命军军票担保，债务人为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宋教仁当夜10点回电，对内田为30万借款成功付出巨大辛劳表示深深感谢，并告知将有人送去1万5千元，“虽然很少，但请作为外交及其他活动费收下。”¹与此同时，内田良平还接下了为革命军输送武器的工作。1912年1月25日下午，北一辉给内田发报，请他帮助检查利用三井银行借款通过三井、高田和大仓等日本商社购进的武器，而内田良平则立即找来日本军人帮助一起前去检查武器质量。²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立即聘请多位日本人为政府顾问，包括**聘请内田良平为外交顾问**，这也是对内田多年来支持中国革命功劳的肯定。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非常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率先承认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1月下旬即开始计划派遣宋教仁到日本进行活动。而他们找到的日本方面的主要联络人，又是内田良平。但是，由于当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派别林立，宋教仁在日本的活动如果取得成果可以增强他的威信，否则反会授人攻击口实危及到宋教仁在临时政府中的地位。与日本大陆浪人有着密切关系、被他们视为“亲日派”³的实力人物宋教仁被排除出权力中枢之外，其实也是日本大陆浪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于是，北一辉和内田良平等人，为了能让宋教仁不虚此行，进行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活动⁴。1月29日日本的国会议员记者律师等一百多名在上野精养轩聚会，要求日本政府在其他国家之前迅速承认“支那共和政府”。⁵2月3日，北一辉再向内田良平、以及有日本政界黑幕之称的浪人领袖人物杉山茂丸⁶等人发电，说明对于宋教仁之行，“孙逸仙的确也请求了犬养君给予帮助，然该君一直采取攻击（日本——引者）政府的态度，故孙氏也没有抱太多期待。”⁷其言外之意不外乎就是这次最主要还是要靠内田良平。

2月6日，北一辉再次以长电向内田良平等人强调宋教仁此次访日之意义：宋教仁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日本，可以一举奠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亲日派”的扎实地位；为了日本的利益，有必要将此次功劳记在宋教仁身上。因为各国为了争取在华利益，所以现在不分南北、竞相向各方提供援助、供给军队及武器。而日本军人和浪人在武昌起义时竟然贪污25万元，此事招致武昌到处贴出禁止日本人入内的标语；而在进攻南京时，日本的商社甚至卖出已经称为废铁无法使用

¹ 「一月二十五日午後二時三十分東京発、上海松崎ホテル喜多輝次郎宛」、「一月二十五日午後十時十分上海発、東京麻布内田良平」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公文備考類⑩戦役等、清国事变(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变書類 卷17 来電(11) マツデン(14)、C08041018900。

² 「一月二十五日上海発、東京内田良平宛」、「一月二十五日午後十時四十五分上海発、東京水明館梅村ゴク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公文備考類⑩戦役等、清国事变(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变書類 卷17 来電(11) マツデン(14)、C08041018900；「一月二十六日午後零時五分東京発、上海松崎洋行喜多輝次郎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公文備考類⑩戦役等、清国事变(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变書類 卷17 来電(11) マツデン(15)、C08041019000。

³ 「二月六日午後八時五十分上海発、東京麻布内田良平、東京京橋杉山茂丸、政友会本部小川平吉、東京青山末岡タケタリ、東京原宿有賀文八郎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公文備考類⑩戦役等、清国事变(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变書類 卷17 来電(11) マツデン(17)、C08041019200。

⁴ 「一月二十五日午後七時四十分上海発、東京麻布内田良平、青山有賀文八郎、青山末岡タケタリ、京橋杉山茂丸宛」、「一月二十五日午後二時四十分東京発、上海松崎ホテル喜多輝次郎宛」、「一月二十七日午前十一時十分上海発、東京麻布内田良平、青山有賀文八郎、青山末岡タケタリ、京橋杉山茂丸宛」、「一月二十八日午前九時二十分東京発、上海松崎洋行喜多輝次郎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公文備考類⑩戦役等、清国事变(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变書類 卷17 来電(11) マツデン(15)、C08041019000。

⁵ 「一月二十九日午後九時東京発、上海ミンリツホ気付、南京共和政府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公文備考類⑩戦役等、清国事变(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变書類 卷17 来電(11) マツデン(15)、C08041019000。

⁶ 頭山満、犬養毅、杉山茂丸、内田良平『玄洋社と黒龍会、あるいは行動的アジア主義の原点』書肆心水、2088年、24頁。

⁷ 「二月三日午後六時四十分上海発、東京麻布内田良平、青山末岡タケタリ、京橋杉山茂丸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公文備考類⑩戦役等、清国事变(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变書類 卷17 来電(11) マツデン(16)、C08041019100。

的武器，以致社会舆论和临时政府中的亲美派再次拿出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观”攻击亲日派和日本本国。所以此次日本政府如果能够充分通过此次机会表明支援革命政府的态度，既能够挽回日本的形象，也能够帮助亲日派在新政权内站稳脚跟、强化地位。¹但是，杉山茂丸2月7日提出宋教仁来日三条件，即必须具有临时政府赋予的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的全权代表资格，不以日本政府之外任何人为交涉对象，不要求虚荣繁华的外交礼节。²其言外之意，不外乎是既要宋教仁具有代表新政权做出最后决断之权限，以便日本政府在谈判时可以真正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同时又不承认宋教仁具有代表中国政府的正式外交使节身份，以不得罪清朝政府。

然而，2月12日清帝逊位。随着形势的骤变，2月13日内田良平给宋教仁直接发出电报，不再提出先决条件：“不仅承认问题，为了商议支那永远安康之道路，请在时局解决以前紧急来日。”³此电文内容抽象，但是却透露出要求让日方参与或参照日方意见决定清帝逊位之后中国未来道路的意思。杉山茂丸和内田良平的行为，显然引起了孙中山等人的怀疑，孙中山提出：“如果得到承认，却有难以保全领土之虞，就不进行和议（“和平谈判”－引者）。”⁴在摸不清日本方面是否有借机提出领土要求的情况下，宋教仁也决定推迟访日。⁵面对这种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局面，内田良平和小川平吉与2月20日分别向宋教仁发出电报，反复申明“满洲独立只是一句虚言，已向当局认证，务请安心。”⁶

事实上，19世纪末期直至辛亥革命发生前后，日本政府当局的中国政策与日本大陆浪人的活动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尽管日本许多政治家对中国抱有侵略野心，但作为一国政府，日本政府不得不以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交涉对象，因而日本政府在孙中山当初来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经应清朝政府之请而设置障碍，在辛亥革命之后也采取观望态度而不肯立即承认中华民国，在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也没有主动抛弃袁世凯而采取支持孙中山一派的政策。然而这在一部分日本人看来，从在开始处理朝鲜问题时与清国发生冲突以来，“政府当局的外交方针总是因循姑息，缺乏为东亚全局而进行远大经纶的气魄。”⁷因此就有了以“在野”身份考虑“东亚经纶”、进行“大陆经营”，以确立日本在东亚的主导地位进而扩大日本“国权”为使命的“大陆浪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大陆浪人”的“大陆经营”，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形似侵略而实非侵略”：日本与清、韩两国之间的关系实为唇亡齿寒，如果两国具有值得结为友邦的实力共同抵御欧洲列强侵略更好，但当今西力东渐年年加剧，支那自身已如同形骸而实成大老衰国，“清韩两国遭到列强侵略之际，余波必然威胁到我国的存亡”。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发生，不如由日本“唤起邻邦觉醒，指导进行改善，在这些国家扶植我们的势力以扩展我国国防线，从而达到保全东亚的目的。”也就是说，“大陆经营”实为一种通过纳中国与朝鲜半岛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中而从欧洲列强侵略

¹ 「二月六日午後八時五十分上海發、東京麻布内田良平、東京京橋杉山茂丸、政友会本部小川平吉、東京青山末岡タケタリ、東京原宿有賀文八郎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公文備考類⑩戰役等、清国事变(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变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17)、C08041019200。

² 「二月七日午後三時五十五分東京發、上海松崎ホテル喜多」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公文備考類⑩戰役等、清国事变(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变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17)、C08041019200。

³ 「二月十三日午前十時五十五分東京發、南京宋教仁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公文備考類⑩戰役等、清国事变(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变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17)、C08041019200。

⁴ 「二月十四日午後十時上海發、東京牛込仲町千早正二郎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公文備考類⑩戰役等、清国事变(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变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18)、C08041019300。

⁵ 「二月十七日午後十時上海發、東京麻布内田良平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公文備考類⑩戰役等、清国事变(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变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18)、C08041019300。

⁶ 「二月二十日東京發、上海松崎洋行宋教仁、喜多宛」、「二月二十日東京發、上海松崎洋行宋教仁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公文備考類⑩戰役等、清国事变(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变書類 卷17 來電(11) マツデン(19)、C08041019400。

⁷ 「对支活動の先驅」葛生能久著『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黒龍会出版部、1935年、310頁。

魔掌中“保护东亚不受侵略的不得已的做法。”¹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亚洲主义”的真髓，大陆浪人之所以敢于不知羞耻地称自己为“东亚先觉志士”，就是来自于他们这种所谓的“东亚经纶论”。然而遗憾的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家们当时也常常以“志士”相称这些大陆浪人们。

大陆浪人们自己在日本坚持“在野”的立场，却对中国的政权更替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且拼命接近中国的政权中枢，这不得不说是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考察先觉志士的大陆经营论，构成其思想根底的毫无疑问就是热烈的爱国心和民族的自信。”² 黑龙会的这段自我表白，不仅能够说明大陆浪人“大陆经营”的性质，同时也能够说明，大陆浪人知道只有通过主张日本国家利益的形式，他们才能够以日本国家为后盾实现个人野心。日本的“大陆浪人”中，其实不乏抱有另辟蹊径、在大陆实现个人野心之人，这也就是他们当初之所以能够从“民权派”轻而易举地变身为“国权派”的真正原因。比起与日本政府面和心不合的关系来说，大陆浪人与日本军部的关系更为接近。他们的“大陆经营论”与日本军部中主张侵略大陆的势力不谋而和，大陆浪人的个人野心使他们能够自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陆的尖兵。

大陆浪人们进行“大陆经营”的第一个对象是朝鲜半岛。为了造成日本侵略朝鲜的借口，内田良平在玄洋社内组织了“天佑侠”，在朝鲜制造动乱。1882年的“壬午兵变”之后，大陆浪人感觉到：“要想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最终势必进一步与支那发生冲突。”“朝鲜被支那吞并意味着我国国防露出破绽，从结果上来说则是阻塞了我国向大陆扩张的出口，不得不说是帝国之大不利。”³ 但是由于事件后日本在朝鲜实力仍然没有超过清国，“让先觉志士不能不深感忧愤”，熊本的宗像政、土佐的中江兆民、奈良的樽井滕吉、爱媛的末广重恭等一起商议“对支方针”，并得到了福冈玄洋社社长平冈浩太郎和玄洋社精神领袖头山满的支持。头山满认为：“得到了大头，小头不劳自得；拿下了支那，朝鲜不招自来；与其与朝鲜冲突，不如直接料理支那。”⁴ 朝鲜问题最终引发了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令日本深感屈辱，开始以俄国为最大敌人，大陆浪人们更是积极主张对俄开战，其目的还是在于夺回日本当年在中国失去的权益，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辽东半岛乃至包括整个东北地区和内蒙东部的所谓“满蒙”地区。

内田良平对中方针的变迁与“满蒙”问题

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不久，孙中山在《民报》的发刊词中，把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孙中山使用的“民权”，可能与他接受日本的近代国家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当时在国内，民主一词已经被讨论和使用，而孙中山此时所用的“民权”实际上也包含了“民主”的涵义，⁵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孙中山为什么舍“民主”而取“民权”来表示他实际上是对民主主义的追求。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已从当时对各个词汇涵义广狭理解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然而却没有人注意到与孙中山有所交往的日本人与“民权”之间的思想联系。

其实，“民权”也是一个近代日本自己发明的话语。孙中山在日本政界最主要的盟友犬养毅，实际上就是日本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的代表立宪改进党的创始人之一；日本所谓“大陆浪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母体，头山满、平冈浩太郎、杉山茂丸、内田良平、平山周、萱野长知、末

¹ 「对支活動の先駆」葛生能久著『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黒龍会出版部、1935年、311-312页。

² 「对支活動の先駆」葛生能久著『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黒龍会出版部、1935年、309页。

³ 「对支活動の先駆」葛生能久著『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黒龍会出版部、1935年、309页。

⁴ 「对支活動の先駆」葛生能久著『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黒龍会出版部、1935年、310页。

⁵ 桂宏诚《孙中山的“民权”、“民主”及“共和”之涵义》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家》内政(研)095-002号，2006年。

永节出身的福冈的玄洋社，最初就是一个以要求民权为口号而建立的政治结社。¹ 大陆浪人中有许多原为武士阶层（日语中称“士族”）出身。因为士族在明治维新过程中被剥夺了特权，加上他们对明治政府中专制和腐败现象不满，1877年爆发了由西乡隆盛领导、以士族为中心的反对明治政府的西南战争（又称丁丑之乱、十年战争）。战争失败后，参加了西南战争或对西乡隆盛的福冈士族，为了继续与明治政府对抗，成立了玄洋社（1878年，初名为向阳社，1881年改名为玄洋社），投入了“自由民权运动”。²但是，在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的日本，国内追求民主的“民权”与对外争取日本国家利益的“国权”，两者之间不存在互相对立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880年时向阳社就曾发起建立“讨清义勇军”，³改名玄洋社时又制定了“敬戴皇室，爱重本国，固守人民权利”的三条纲领等事例上得到印证。⁴由于明治政府1889年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实行了第一次议会大选，使“自由民权运动”失去奋斗目标。坚持走在野道路的玄洋社，将更多精力投向追求国权，由此催化了大量具有国权主义思想的“大陆浪人”的诞生。因此，孙中山不可能不知道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历史，也不可能不清楚在这些人从民权主义者向国权主义者的蜕变过程中民族主义思想的催化作用。尽管孙中山日后解释的“民权主义”内容，与日本当年的“自由民权运动”有着很大的差异，然而也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孙中山在选择中国走民族国家道路的同时，在东京选择了使用“民权”一词时没有受到围在他周围的日本大陆浪人思想的影响。

如上所述，日本的大陆浪人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其实都有一定的目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将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之中。按照黑龙会日后的说法，清朝末年以来瞄准中国的日本大陆浪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希望借中央纲纪松弛、地方匪贼横行之机，自己来到中国甚至不惜成为匪贼首领以开拓新天地之人；二是耐心等待中国国内出现叛乱，支持叛乱力量打到清朝政府并实现支那更生之人；还有一种就是认准“先下手为强，将迟早逃脱不了遭到欧洲这些虎狼之国侵略的支那拿到手中才为上策”之人。⁵而黑龙会内田良平一派选择的是第二种道路，因为“孙逸仙等来到日本为准备革命频频奔走时期，孙曾说过只要日本援助革命党，革命成功之际支那为日本而让出满洲之类的话。”⁶按照内田良平1927年的说法：“我们赌上生命援助孙的革命，是因为它与日本的利益一致。孙举起的大义名分的革命旗帜为灭满兴汉，驱除满人并建立汉人的中国。所以我们可以帮助汉人将满人逼到不得不借助俄国力量的地步，然后日支合手打败俄国，将满洲和西伯利亚收归我有，一举打下大陆经营的基础。”⁷所以，黑龙会及其周围的“大陆浪人”们“期待随着革命的成功而调整两国关系、解决满洲问题，因此才极大地援助了革命党。”他们当时认为，孙中山“即使做不到像他所说的那样放弃满洲，至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达成协议，将该地区完全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从而排除威胁东亚不安的因素。”⁸

出于这种考虑，辛亥革命发生以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内田良平一直主张日本要支持中国“保全领土”。⁹1911年12月他在黑龙会本部编辑的《内外时事月函》中发表《支那改造论》，指出日本政府争取主动，由日本指导“改造支那帝国，建设新政府”的重要性。按照内田良平的说法，日本能够帮助发生革命后的中国决定未来国家形式的，无非有三种方案可行：一是“保护

¹ 1913年3月，孙中山还到福冈亲自瞻仰了玄洋社的墓地。

² 井川聡、小林寛『人ありて、頭山満と玄洋社』海鳥社、2003年，44頁。自由民权运动（1874—1890年），主要主张为制定宪法，开设民选议会，减轻地租，保障言论和集会自由。

³ 石瀧豊美『玄洋社発掘、もうひとつの自由民権』西日本新聞社、1981年，22—26頁。

⁴ 『玄洋社社史』（原著1917年）、明治文献、復刻版223—225頁。

⁵ 「对支活動の先駆」葛生能久著『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黒龍会出版部、1935年、312頁。

⁶ 「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葛生能久著『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中、黒龍会出版部、1935年、318頁。

⁷ 内田良平自伝『硬石五拾年譜』（原著1927年）、葦書房、1978年、77頁。

⁸ 「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葛生能久著『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中、黒龍会出版部、1935年、318頁。

⁹ 内田良平「分割乎保全乎、对支那大陸の根本政策問題」『太陽』第19卷第2号、99—101頁。

满清朝廷，镇压革命党，改革现政府，保全清国”；二是“两分支那，以黄河以北为满清政府区域，黄河以南为革命党政府区域，各自建设适合支那国情的政府”；三是“废除满洲皇帝，以革命党政府取代满清政府，建设一个新机轴的联邦共和国”。¹ 然而，第一方案即“清国保全案”虽然是欧洲列强之所望，然因满清政府腐朽透顶实为最难实现；第二方案即“支那两分案”只能是一时权宜之策，因中国具有追求统一和民族融合的历史传统，所以从消除内乱的角度来看并非是“东亚永远之策”；第三方案即实施联邦共和，不仅符合中国历史传统、儒教传统和国民性，还可以杜绝人种倾轧、动辄革命的祸根，促进吸收先进文明，因此日本政府应该“活用主动地位与主动势力，让列国赞成日本方案，完成解决支那问题的任务”。²

《支那改造论》中有这样一段对日本政府的警示，非常耐人寻味：“如果我国政府当局者依然采用因循姑息的手段，步列国尤其是俄德两国的后尘，扶持老朽的满廷，压制革命党，在北方就会失去帝国在满洲的优越地位，在南方长江一带就会丧失帝国已经到手的利益圈，而误国家百年大计。”³但是，内田良平为什么认为“保全清廷”就会使日本失“在满洲的优越地位”呢？反言之，内田良平为什么会暗示日本政府如果支持革命党建立联邦共和政府就会能得到强化日本“在满洲的优越地位”的效果呢？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是不是与他们所说的孙中山当年有关“满蒙”的言论有关。

然而，第一次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落在了袁世凯手中，这使黑龙会内田良平当初希望通过扶持亲日势力掌握政权而拿下“满蒙”的打算完全落空。在他们看来，“第一次支那革命因为袁世凯的出现，其结果恰似播种下稻谷却只收获了稗子。”因为“老辣的袁世凯反而利用满洲问题，提出同胞睨墙就会被日本夺走满洲，所以应该迅速停止内争而一致对付日本，并以此点为契机压制革命党达成了妥协，自己坐上了大总统的位置，使孙向日本的有志之士所承诺之事顷刻化为乌有，形势已经变得难以顺利圆满解决满洲问题。”⁴ 出于在朝鲜问题上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袁世凯对日本抱有很深的戒心和反感，因此也成为日本大陆浪人在辛亥革命发生后的主要防备和攻击对象，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南北媾和，反对孙中山将政权让于袁世凯，“一旦袁世凯左右时局，万事皆休”。⁵日本的大陆浪人们，其实很清楚亲日派掌握中国政权对于他们在中国扩张日本国权上的作用。

许多大陆浪人在辛亥革命以后，仍然对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抱着很大的期待。内田良平日后公开提到，当年孙中山曾经亲口对他说道：“原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功之晓，即令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也。”⁶ 但是从前述孙中山反对以领土为条件换取日本政府承认一事来看，即使孙中山当年有过类似的发言或“承诺”，毫无问题也只是一种为了寻求支持、以早日推翻满清政府夺取政权的便宜之语。民国元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在一次与记者谈话时，记者问他：“满蒙现状若何？”孙中山回答道：“中国方今自顾不暇，一时无力恢复蒙古，惟俟数年后，中国已臻强盛，尔时自能恢复故土。中国有四万万，如数年后，尚无能力以恢复已失去之疆土，则亦无能立国于大地之上。余深信中国必能恢复已失之领土，且绝不需外力之帮助。”⁷

¹ 「支那改造論」黒龍会本部編『内外時事月函』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号、20頁。

² 「支那改造論」黒龍会本部編『内外時事月函』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号、21-26頁。

³ 「支那改造論」黒龍会本部編『内外時事月函』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号、27頁。

⁴ 「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葛生能久著『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中、黒龍会出版部、1935年、318頁。

⁵ 「二月十日東京発、南京宋教仁宛！！Songchouyen」、「二月十日東京発、上海 Torajo 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省公文備考類⑩戦役等、清国事变(自)明治44年～(至)大正2年 清国事变書類 卷17 来電(11) マツデン(17)、C08041019200。

⁶ 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40頁。

⁷ 孙中山《中国若无能恢复已失去之疆土则亦无能立国于大地》民国元年春在南京与报馆记者谈话，（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国父全书》，1960年，496頁。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在这篇文章中孙中山为何只谈起蒙古而没有言及“满洲”，但是仍然可以从其中感知辛亥革命发生、尤其是就任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在“满蒙”问题上开始具有强烈的领土意识。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 1913 年春天开始逐渐改变他的对中国方针，¹很可能就与孙中山的这种态度有关。1913 年 7 月内田良平与 1890 年时已经开始策划“满蒙独立”²而被称为“满洲建国先驱者”的川岛浪速³合流并结成了“对支联合会”，开始着力推动分裂“满蒙”的工作，⁴这就是内田良平在《对支私案》、《对支问题解决鄙见》等中提出分割中国方针的背景。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对支私案》中有“欲于将来进一步扶持亲日势力，最妙的就是让该党中有德有力的黄兴等成为新政府的首脑人物”一文，认定国民党中“有德有力”的不是孙中山，而是黄兴，这是内田良平对孙中山态度发生转变的最好注解。它说明，走到分裂“满蒙”这一步的内田良平，已经不再认为孙中山值得日本扶植，因为孙中山在分割“满蒙”于日本的问题上背信弃义。

内田良平在其 1914 年提交给日本政府有关部门的《对支问题解决鄙见》中，已经完全抛弃了他 1911 年 12 月在《支那改造论》中所提倡的保全中国领土、在中国实现联邦共和的主张，公然提出“支那的共和政体将来必然成为实现日支提携的一大障碍”，为了保证日本能够对中国进行指导的地位，必须借机“改变支那的共和政体为立宪君主制，以与日本的立宪君主制形式相统一”。《对支问题解决鄙见》中的中日两国《国防协约私案》（即前文所述及“21 条”的蓝本），公然提出要让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及内蒙古的优越地位，将统治权委托给日本”，同意日本拿回德国所占的胶州湾地区铁道矿山及一切权益，同意租借福建沿海重要港口给日本建设海军根据地，同意将改造陆军和建设海军事宜委托给日本，同意一律采用日本兵器规格，甚至要求同意日本在中国发生内乱时有权向中国出兵。⁵ 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这个《协约》，他还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这样一个“帝国支援支那民众要诀”：“促使以革命党、宗社党为首的各种具有不公平感觉的党派四处起义，在中国国内陷入混乱状态、袁政权土崩瓦解之际，我们从 4 亿民众中选择拥立最有信誉最有名声者进行支援，通过他实现改造政府和统一国家的大业，并由我国军队来恢复秩序，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因此（让日本——引者）得到人民悦服、政府信赖，这样就轻而易举地达到签订国防协约的目的。”内田良平在《对支问题解决鄙见》中还说道：要想让中国陷入混乱状态并非难事，只要我帝国对以革命党和各种具有不公平感觉的党派偷偷稍稍加以援助，他们便会立即一起举事。⁶ 这一点，应该是内田良平在他长年与中国革命党人打交道中所得出的真实体会。

不仅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许多辛亥革命的领袖，都和日本大陆浪人发生过种种联系，都曾经得到过日本大陆浪人的有力支持。应该说，直到今天发现的各种历史文献资料，还不足以证明这些革命领袖们当年的确向日本的大陆浪人做出过割让领土的正式承诺。⁷ 然而即使如此，为什么内田良平等日本大陆浪人会按照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灭满兴汉”的思想脉络中强调他们从中国分裂“满蒙”的合法性？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¹ 初瀬龍平『伝統的右翼内田良平の研究』（北九州大学法政叢書 1）、九州大学出版会、1980 年、172 頁。

² 「川島浪速の支那渡航と最初の滿蒙建国計画」葛生能久著『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中、黒龍会出版部、1935 年、242 頁。

³ 「滿洲建国の先駆者川島浪速」葛生能久著『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中、黒龍会出版部、1935 年、212 頁。

⁴ 初瀬龍平『伝統的右翼内田良平の研究』（北九州大学法政叢書 1）、九州大学出版会、1980 年、173 頁。

⁵ 「对支問題解決鄙見」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1 門政治，1 類帝国外交，2 項亜細亜，『支那政見雜纂』第一卷 15，B03030268800。

⁶ 「对支問題解決鄙見」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1 門政治，1 類帝国外交，2 項亜細亜，『支那政見雜纂』第一卷 15，B03030268800。

⁷ 藤井昇三「孫文と『滿洲』問題」『関東学院大学文学部紀要』第 52 号（昭和 62 年）。该论文是日本至今为止“孙中山在‘满洲问题’上，从革命开始初期到 1918 年为止，对日本采取了相当妥协的态度”之事利用各种史料进行论证最为深刻的论文，其中最为重要的证据是一些日本人之间的电报往来，其中有就日本租借“满洲”一事孙中山的并不十分明朗的口头应允，没有显示孙中山的任何亲笔文字。

结 论

笔者向来认为，比起中国与欧美的关系来，中日关系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发生了更加直接和更大强烈的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就是中国近代革命家们从日本学到了建设“民族国家”的思想。这一点，也是从努力追求单一民族国家的日本之外的国家所无法学到的地方。日本追求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造成许多日本国民自己也相信了他们具有其他国民所无法比拟的民族优越性，因而大言不惭地说指导东亚以不受欧洲侵略是自己的天职、日本具有拯救东亚的使命。但是因为这种所谓的“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国权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包裹在亚洲主义中的民族优越感必然不断膨胀，最终导致日本逐步走向一个侵略国家并走向了毁灭。本文利用日本外务史料馆所藏当年外交文书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当年军事文书，以及当事者当年的叙述，从日本“大陆浪人”与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中国革命之间关系的角度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辛亥革命发生之前，由于革命党当时处于非法地位，所以支持中国革命家活动的多为日本在野人士，而其中当然又以将自己政治活动的舞台主要定位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大陆浪人为主。“民族国家”的思想不可能是大陆浪人的发明，但却是造成他们个人野心不断发酵的触媒。纵观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能够发现他们心中都有一种盲目的日本民族优越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孙中山等革命家是为了推翻满清王朝才追求民族国家，而日本的大陆浪人们却是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革命家追求民族国家的意义。那就是，他们从革命家提出的“灭满兴汉”和“驱除鞑虏”中看到了一种将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甚至西藏地区囊括进日本势力范围，甚至变为日本领土的契机。

在围绕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周围的诸多日本大陆浪人中，即使有一部分可能没有像内田良平那样直接表露出对扩张日本在中国势力范围的兴趣，但是从他们与内田良平一直都能够互相配合默契进行活动上，可以看出他们不可能不清楚黑龙会支援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从各种文献中也可以看出，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当年也并不是没有察觉到日本大陆浪人的这一动机，也许是认为必须真正实施“灭满兴汉”和“驱除鞑虏”，也许是为了得到支援以便早日达到推翻满清政府、夺取政权的目的，他们从来没有对大陆浪人的这一想法进行正式批评，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民权、政权、国权，孰重、孰轻？在中国革命家们和日本黑龙会那里会有不同的理解；敌乎、友乎？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价值判断中必然发生变异；这些看来似乎让人难以接受的历史，让我们不得不再次深思民族国家思想出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利弊。

【书 讯】

《走向民族国家——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思想诞生的国际因素》，

王柯著，商务印书馆，2011年

《西陲烽烟——20世纪东突运动历史研究》，

王柯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李健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